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

山东叛乱

1774年王伦起义

[美] 韩书瑞 著 刘平 唐雁超 译



凤凰文库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

山东叛乱

1774年王伦起义

[美] 韩书瑞 著 刘平 唐雁超 译



凤凰文库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美]韩书瑞著;刘平,唐雁超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214 - 04868 - 4

I. 山... II. ①韩... ②刘... ③唐... III. 农民起义—中

国—清代 IV. K249.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0216 号

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 by Susan Naquin

Copyright © 1981 by Yale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s © 200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 - 2006 - 328

书名 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

著者 [美]韩书瑞

译者 刘平 唐雁超

责任编辑 王田

装帧设计 武迪 姜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1304mm 1/32

印 张 6.5 插页 4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4868 - 4

定 价 20.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学勤 李强 汪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郭齐勇 洪银兴 钱乘旦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任 谭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吴小平
成员 刘健屏 黎雪 张胜勇 王瑞书 吴星飞
顾华明 姜小青 黄小初 顾爱彬 刘锋
余江涛 吴迪 吴源 胡明琇 章祖德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主编 刘东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王保顶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特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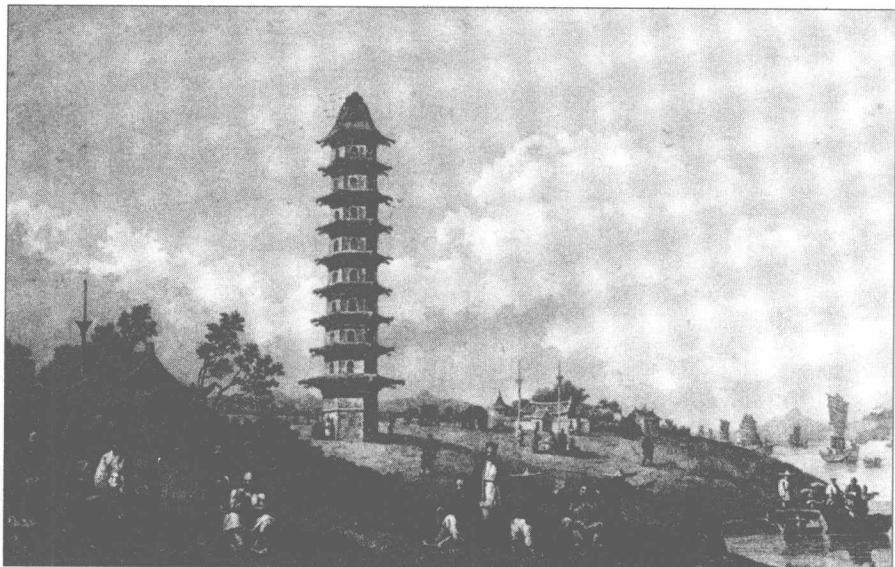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遂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以宝塔为斜轴，南望临清，右边是大运河，宝塔后面可见临清城的城墙，远处是山东的山丘。见乔治·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797, 对开本)“在大运河岸边的临清附近看到的景色”。

谨以此著献给李世瑜——我的老师和朋友，1979年我们首次见面，跟他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愉快，这些年来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译者的话

1920 年代初的某个晚上,金陵大学,一栋独门两层楼房,忙碌了一天的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开始静下心来继续构思她小说中的主人公王龙的形象。正是这本名为《大地》(The Good Earth)的小说,使她分别在 1932、1938 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的《大地》以及诸多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是欧美人士观察中国的一扇梦幻之窗。1960 年代初,美国一位中学女生成为“赛迷”,并憧憬着“一定要到教中文的一个大学”念书。她,就是今日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韩书瑞(Susan Naquin)教授。^①

韩书瑞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系执行主任。1966 年,她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并获得前往台湾学习中文的机会,1968 年在耶鲁获得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1974 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她进入宾西法尼亚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93 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

韩书瑞是最早前往台北利用清朝档案的美国学者之一。也许是

^① 本文所述韩书瑞的经历,主要来源于作者本人提供的简历,以及周武:《用新材料讲新故事——韩书瑞教授访谈录》,《史林》2005 年第 6 期,有引文而未加注明的,出自后者。

出于幸运,她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找到一大批关于1813年林清、李文成天理教起义的口供资料,构成她的博士论文、也是她的第一本著作《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的骨架。不久,她继续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资料,开始写作《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一书。1979年春,加州大学(伯克利)的魏斐德教授建议韩书瑞与匹兹堡大学的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合写一篇关于18世纪中国社会的文章,当时双方并不认识,同年6月,美国方面派出一个明清历史代表团到中国,魏、韩、罗都参加,历时两旬,后来,韩、罗终于把一篇文章写成了一本书,即《十八世纪中国社会》(*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6年),填补了清史研究两头热(17、19世纪)、中间冷(18世纪)的空白。

在写作上述几本书的过程中,韩书瑞发现,“第一,没有人研究宗教;第二,宗教在中国社会不重要。我可以利用宗教研究中国社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她和于君方(Chün-fang Yü)教授共同召集了一次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的学术会议,会后两人编成一本论文集《香客与圣地》(*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她自己收入书中的一篇文章《北京妙峰山的进香》开启了她在后来很长时间里的有关明清时期北京寺庙与民众生活、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研究,2000年终于出版了那本令人耳目一新、厚达800多页的《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以下简称《山东叛乱》)是作者深化清代民间宗教与农民起义研究的一部力作,出版后得到欧美中国学界的好评,美国的穆黛安(Dian Murray)、裴

宜理(Elizabeth J. Perry)、刘广京(Kwang-ching Liu),英国的巴雷特(T. H. Barrett),法国的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等学者均撰文介绍^①。中国国内也有学者曾经对其中的部分章节做过译介。^②

《山东叛乱》的主体由两大部分构成:准备、叛乱。除了对1774年王伦起义事件进行全景式描述以外,作者主要提出了以下有价值、给人以启发的观点。

1. 在我们追寻西方学者的脚步寻找新理论、新方法来解读历史时,一些西方学者依然坚持传统的研究视角。2007年,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在其成名作《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的中译本写序时就说道:“至少在我看来,我们对政治事件遭受失败的原因的理解往往是从自然环境的充分影响开始的”。^③当然,这只是第一步。裴宜理在其书中对淮北地区传统农民反抗的生态土壤与社会环境作了精致的梳理,而同期出版的韩书瑞的著作也是从大量分析山东西南地区的生态、社会问题入手的,但是,她发现,“这场起义并非起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是归因于白莲

^① Dian Murray's review,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2), pp. 815—17.

Elizabeth J. Perry's review, in *Peasant Studies*, Vol. 10. No. 1 (Fall 1982), pp. 59—65. 该文题为 *Millenarianism and Rural Rebellion in China* (《中国的千年王国思想与农民叛乱》),系对韩书瑞的《中国的千禧年叛乱》、《山东叛乱》与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的 *Folk Buddhist Religion: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中译本名为《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进行比较研究。

Kwang-ching Liu's review,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 1982, pp. 1141—1142.

Shih-shan H. Tsai's review, in *The Historian*, 44:4(1982), pp. 570—571.

T. H. Barrett's review,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17.2(1983), pp. 333—352. 该文题为 *The Study of Chinese Eschatology* (《关于中国末世论问题研究的评介》),系对有关中国宗教、民间宗教、农民叛乱的多种著作的综合评论。

Pierre-Etienne Will's review, in *Histoire de L'Asie, Annales*, 40(1985), 959—63.

^② 杨品泉:《一七七四年山东王伦起义》导言,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2期;杨品泉:《一七七四年王伦起义的教派》,载《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四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22—643页。

^③ [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中译本序言,该书译者为池子华、刘平,商务印书馆,2007年。

教活动本身，尤其是王伦自己成功的传教活动。”^①他们的观点给我们的启发是：农民反抗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两种基本的原因，一是外力压迫（客观因素的作用偏重），二是自身意向（主观因素的作用偏重）。中国宗教（尤其是宗教异端与民间宗教）与农民反抗有不解之缘，宗教领袖的个人意志与社会活动往往成为叛乱的前奏曲。^②

2. 揭示了中国民间教派与农民叛乱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这些教派可能同时具有虔诚、献身、激进与革命的性格。它们的千禧年思想深入到各个教派之中，成为其信仰的核心，即使是在蛰伏阶段，也不会完全失去发动信徒起事的能力（中译本第3页）”。在这一点上，韩书瑞与欧大年的观点是相左的，后者认为“他们是好人，是很诚实的教徒，他们是不要找麻烦的这种人”，韩书瑞则称：“有人把他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做了对比，可是我觉得这些人非常复杂，不可能那么清楚”。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他们的观点：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国家与社会”或是“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最直接地体现在“朝廷与农民”的关系上，其常态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幅河清海晏、其乐融融的图画；其变态的关系则是双方发生严重流血冲突的最高阶段——农民造反。在日常情况下，教徒们（农民）都是善良的；在非常情况下，教徒们（战士）则变得勇敢（凶恶？）。而这些教徒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作“善良的人”（邪匪？）？为什么在没有压迫、尚能温饱的情况下，他们也要跟着领袖出生入死呢？这些问题为后来的学者留下了更多的探讨空间。

3. 实际上，韩书瑞对上述问题有自己的解答，她把清代教派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念经型”和“打坐运气型”。她说：“前一种类型的特点是着重于祭祀和诵经的集会，坚持吃斋，遵守佛门戒律，比较熟悉流传的教派经卷。……在第二种类型中，师父很少会见到聚集一起的

① Kwang-ching Liu's review,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 1982, pp.1141—1142.

② 参见刘平《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2002年）的结论部分。

徒弟,他传授打坐运气和拳棒武术等功夫,以增强体质和自卫能力,在举行仪式时并不依靠宗教经卷。在念经型教派中,信徒们的生活重心在于教派活动,并且被亲密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联结在一起;在打坐运气型教派中,其组织更具等级性,更加散漫,教派(的集体)活动在信徒生活中只占较小的部分(中译本第61页)”。确实,就像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提出的“南会北教”的观点一样,尽管粗略(许多吃斋念经型教门,如无为教、清茶门教、老官斋教,也经常发动叛乱),但是非常形象。

4. 作者较早、较完整地阐释了“千年王国”、“末世论”(“末劫”)观念对王伦起义甚至整个清代农民起义的影响。她认为:“就像观察更大的社会变动一样,通过研究这些白莲教派本身的历史和动力,试图解释王伦教派突然爆发的千禧年活动,简单而有益。我曾经提出,这个人之所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在于他能够为其教派能量的爆发寻找一个新的出路,并通过叛乱造就一个完整的群体(中译本第174页)”。今日,“末劫”思想乃是民间教派发动叛乱的思想动力的观点已经不用质疑,但其中丰富的思想内涵,却有必要不断加以探索。在韩著出版20多年后,中外学者还专门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①

而且,作者确实给了后来者这样的启示:历史上许多为了称王称帝而造反的农民领袖,与我们传统的研究理路确实有很大差距,无论是阶级压迫,还是经济关系、社会结构,都不能单方面构成叛乱的原因。但是,分析领袖们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叛乱动机,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拿王伦来说,本来也是一方头人(或可称为地主),但是为了“逞其邪说,谓本乡有黑风劫,遭之者死亡相继,宜出门远避。经七七之期,庶可免耳”;和尚樊伟则对王伦说:“予为君擘画,十年当为君,姓上加白字,毋自弃也”(俞蛟:《临清寇略》)。最终,王伦,一个五短身材

^① 秦宝琦、[美]王大为、[加]白素珊:《千年王国与白阳世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的家庭长子、慈善家、行医人、气功(拳棒)师、宗教预言家,以其自身魅力和超人格魅力(成功预言某日有大风雨),召集了众多身份各异的乡民和乡间游民(4 000 人),在一个短时期内(一个月),发动了一场在清代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造反——甚至被视为清代衰落的先声,其“宗教外衣”、个人魅力、社会遭遇等,在韩书瑞的笔下,一幕幕地展现开来。

自然,在今天看来,韩书瑞的这本著作除了研究“民间宗教与农民叛乱之关系”的权威性、学术史的开创意义之外,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下面试做分析。

首先,本书的结构有一点不对称。除了导言、结论之外,本书主要由第一部分“准备”、第二部分“叛乱”构成。第一部分中的“背景”实际上是在分析王伦所在的寿张县的自然、社会状况,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寿张作为华北地区的一个普通县份,作者的大量“背景”分析并没有推论出其与王伦起义的必然关系;起到弥补作用的是“教派”部分的分析,份量偏少。第二部分是本书主体,份量过大。实际上,作者应该增加一部分,因为作者依靠的主要史料是清代档案,尤其是案犯口供,作者似乎应该以此为基础,针对这次起义的社会影响展开分析(作者在第二部分使用的是“余波”一节)。庶几在结构上可以对称。

其次,作者对“王伦起义”的研究带有开创性,但因为这一史实本身的复杂性,作者在论述中存在着含糊不清(自相矛盾)、挖掘不深的缺陷。穆黛安曾经在其评论中指出作者三个方面的不清晰,这里试举两点,第一,“是王伦这个富有魅力的个人、华北平原的特殊环境,还是某些不可阻挡的社会力量在这次叛乱的发生上所起的作用最为关键?结果,我们在导言和结论部分看不到作者一个一以贯之、令人信服的观点”;第二,“一般历史书把这场起义视为清朝衰落的起点,韩书瑞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无论是王朝本身还是其统治下的社会

都处在一个鼎盛时期,(但她在结论中又说)清王朝在镇压这次起义中所取得的最后胜利‘可以被看作并非是出于其力量的结果,而是由于叛乱运动自身失败的结果’(原书第151页)。人们也许会对王朝自身的健康发问,它能击败一场最多只有4 000人的叛乱,难道只是因为其对手存在着缺点吗?”^①确实,传统观点可以探讨,在提出新的观点之后,是否应该考虑其内在逻辑的合理性呢?此外,作者在对王伦起义中的“妖术”、“两性关系”、“起义目标”等问题的探讨方面都应该更加精密。至于挖掘不深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后来者的观点,有关八卦教、清水教、天理教等民间教派的源流、传播、教义等问题,在后来的研究中,已经有新的突破。^②

再次,在一些文字、术语的引用、理解方面,还存在一些瑕疵,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已经一一订正。

在新形势下的“西学东渐”潮流中,我和唐雁超能够翻译韩书瑞教授的这本著作是我们的幸运,也希望广大读者批评。

刘 平

2008年6月22日于石头城下

^① Dian Murray's review,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2), pp. 815—17.

^② 参见马西沙著:《清代八卦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以及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